

“东北亚区域合作与整合” 研讨会综述

王江丽

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2012年,随着日韩独岛(竹岛)之争、中日钓鱼岛等领土争端的升级,以及朝鲜成功发射卫星等事件,使这一地区不断出现外交和安全紧张情势。2012年12月14—15日,由浙江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承办的“东北亚区域合作与整合:东北亚和平环境建构——从文化因素与物质力量的互动关系中探求建设性路径”国际会议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日本明治大学、韩国延世大学等国内外学术机构的40多位学者与会,从文化视角解析当前东北亚地区出现的新局势及面临挑战,以及可能的应对之策。现将与会学者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寻找可能路径:从文化因素思考东北亚地区和平建构

在理解东北亚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寻求东北亚国家间领土争端问题的解决上,除现实主义外,文化研究路径提供了另一种思考向度。与会者认为,以2012年东北亚地区领土争端升级为例,虽然现实主义似乎更具解释力,甚至出现了“目前东亚正在发生新冷战”的观点,但仅以现实主义的权力路径来思考显然是不够的。在物质路径之外,从文化视角探讨和寻求东北亚地区和平建构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日韩三国秘书处秘书长申凤吉指出,只有在文化和价值上寻找到相互

* 王江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邮编:310012)

认同,才能使东北亚地区国家间从冲突和战争记忆中真正走出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具有可以形成共同价值的现实文化基础。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巴里·布赞认为,社会文化路径不仅为共同认同,而且也为东北亚地区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更深刻、细致和多样的思考向度,例如,秦亚青的以关系为核心的过程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的基本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及东北亚社会和外交中独特的面子意识等。

在强调文化研究路径可行性的同时,与会者也提出要注意文化自身的局限性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美国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认为,文化路径(软路径)的确有助于分析东北亚局势,但也有其缺陷和局限性。以东亚安全合作机制为例,恰恰是文化传统习惯,即东亚国家更喜欢分散的而不是制度化的方式、双边的而不是多边的方式来谋求地区冲突的解决。加之历史宿怨与彼此怀疑,使得截止到目前东亚除了一个基于权力平衡或双边安全协议基础上的冷和平之外,还很难找到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和平道路。美国波士顿大学托马斯·伯杰(Thomas Berger)副教授认为,要警惕文化研究方法上的困难和潜在陷阱。在西方理论的地方适用性问题上,应采取折中态度,既不需要(也不必)完全拒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要将之与地方特色和现实相结合,只有将东北亚各国的自身视角和文化理解进行细致考察,才能对该地区的政治和外交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认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关系主义”理论,倾向于家国主义和面子,家国主义认为国家间关系并非仅仅是“朋友”、“敌人”和“竞争对手”三类,而是可以扩展至“父子”、“兄弟”和“同胞”等多种关系,从这些关系中产生的“你安全,所以我安全的”思维向度,有益于扭转目前在东北亚地区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僵局。

二、历史与现实: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解决方案

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举措严重损害了中日建交以来所取得的双边关系成果,两国关系再次陷入低谷,也直接影响着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与会学者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就争端的原因、历史、双方政策解读和前景做了集中讨论,看法多样并存有分歧,特别是在中日学者之间出现激烈交锋。

关于此次钓鱼岛争端中中日两国的政策,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东乡和彦教授认为,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完全失败的,特别在经济上日本的损失比中国大得多。他认为,日本应当从威慑和对话两方面入手来应对钓鱼岛争端,并提出三个具体建言:对话应是无前提的;应继续“三不”政策即不许中国进入钓鱼岛、不许中国在岛上研究、不许中国在岛上兴建工事;应当倾听中国的声音。就日本国内而言,各方力量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态度和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平野睦

副教授进行了逐一分析。她认为,日本政府的基本观点是否认争端的存在;日本在野党历来与政府意见不合,在争端问题上,各党也意见不一。日本学界的意见与政府大致相同,但少数历史学家站在中国一方。日本民众并不关心争端,关心的是该事件会不会影响到国内产业和他们的工作。这些力量如同在一条没有方向的船上,相互之间缺乏深度交流,因此也无法做出实质性举措。

日本明治大学伊藤刚教授提出,日本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对日本政府购岛一事如此愤慨。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做了正面回应,并用“真理”与“和解”概念解释了将钓鱼岛争端留待将来的策略。他指出,“真理”意味着不仅从本民族国家也要从其他民族国家的角度承认和正视历史,日本应当承认和正视其现代侵略、殖民和施暴史,承认和正视它们造成的极为不义的灾难性后果,吸取起码的真实教训。“和解”要求一是既尊重本国人民的记忆和情感,也要尊重别国人民的记忆和情感,当这两者之间有不解解决的抵触时,一般要在尊重根本“真理”的前提下,尽可能予以缓解甚或淡化;二是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历史宿怨,以现今和未来为重,以核心(而非边际)的历史真理和紧要(而非次要)的现今国家利益为处理问题的首要准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从民族的历史记忆角度强调,和解是中日关系目前迫切需要的。

在和解的方法上,有学者尝试从文化和国际法的角度来探讨可能性。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崔顺姬提出,东北亚的领土争端是否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先例。例如,厄瓜多尔和秘鲁领土争端的解决方式,但与会学者认为二者的可比性较低。美国诺德士研究所马克·瓦伦西亚研究员(Mark Valencia)认为,如果能以国际法的手段先解决中国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则会为钓鱼岛争端以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形成鼓励的和先行样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莫凯歌(Gregory J. Moore)强调,“面子”是分析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和行为特别是中日此次钓鱼岛争端升级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在寻求解决方案时,双方都应特别注意给足对方“面子”。

三、文化与认同:东北亚各国外交特点的分析与解读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与会学者从多重角度分析、解读了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的外交特点。台湾国立大学政治学系石之瑜教授认为,文化是帮助决策者作出理性外交决策的可靠预兆。中国的文化、文明体系中存在出于长远考虑的理性,这种长期的计算在西方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中虽然也有一定的体现,但西方会更注重对短期和长远收益更精确的比较,而中国则偏好后者。因此,就中国如何保持与他国长远的稳定关系,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重视并保持中国的独特性,拒绝或是同化外来的文化;二是重视文

化的多样性与互利共赢,中国应该向其他文明开放、学习,并且输出自身的文化影响力。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蒲晓宇从身份信号视角,解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时而低调、时而高调的不同表现。

除了文化与认同,与会学者认为历史和地缘问题也影响了东北亚国家的外交决策。日本东京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玉本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亚国家之间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相互间的历史问题。韩国东北亚历史基金会秘书长石东演强调,韩国应当时刻警醒,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韩国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大陆或海洋大国争夺的牺牲品。

四、冲突与合作:环境、经济合作及其他动力因素

虽然存在着领土争端,但东北亚地区各国间的经济、环境领域的合作在近几年有了长足发展。与会学者从经济、环境领域及大国的介入等因素,探讨了该区域的合作机制建设及其对解决领土纠纷可能的积极意义。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白永辉(Jean-Marc Blanchard)认为,中日经济合作不断加深扩大,经济因素(从经济角度对冲突所造成的损失预见和后果分析)显然能够成为抑制和缓解领土争端升级的一个重要变量。韩国首尔高丽大学郑瑞溶副教授谈到,东北亚国家的特性使得它们不愿将领土争端诉诸国际法庭,而倾向以双边方式解决问题,但往往各自一味强调自己的立场与主权,不会考虑将争议领土分配互利。环境问题的凸显及东北亚区域环境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或许能对东北亚地区的整合与缓解领土争端产生有益影响。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梁微副教授和伊藤刚都认为,美国是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介入因素。伊藤认为,中日美在东亚互为依靠,美国是利益提供方,对许多亚洲国家占有支配性的主导地位,在力量三角中占有更大比重。他认为,中日之间的合作很难顺利开展,一是两国在文化上存在很深误解,二是源于美日军事同盟。对于后者日本只是希冀寻求安全保护,而就前者来说,中日两国要实现争端解决并谋求良性合作,必须同时冷静下来,积极地去准确理解对方。